
Meetings: The Operation of Grassroots Political Power in the Northwest Shanxi Anti-Japanese Base Area

Jingzhi Yue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781571739@qq.com

开会：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的运行机制

岳靖芝

北京大学历史系

Abstract: Grassroot communities are critical fields of governance. To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to mobilize, organize, and arm the people to fight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ders, the Communist Party employed a number of methods in the base area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mong them, holding meetings wa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get the work done and to forge leadership in local governance in the base areas, and it built a space of power that incorporated and displayed both group and individual experiences. Though the endless rounds of meetings can be seen as a kind of formalism, they provide a pivotal angle to observe the operation of power in the Northwest Shanxi Anti-Japanese Base Area.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whose purpose was to reshape the countrysid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wa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their formulation. The villages were the critical places where the Party interacted with the people, where most of the meetings occurred, and where most of the policy directives were implemented. Grassroot meetings in the base areas revealed directly the willingness of the people to participate as well as their on-site performance, and indirectly the response of the people toward the Party's policies and how the Party dealt with that response. Making decisions, mobilizing and organizing the people, and implementing policies were the basic functions of meeting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itution of meetings and the twists and turns of its practice reflected the gaps between the Party's ideal and practice, and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orthwest Shanxi Anti-Japanese Base Area,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ve mechanism, meetings

摘要：基层社会历来是国家治理的主要场域。为促进基层政权健康发展，更好地动员、组织、武装群众，使之积极投身抗战，中共在根据地施行了多项举措。其中开会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式被广泛运用于中共基层政权运行体系，群体经历、个人体验皆全方位地展现于其所建构的权力空间之下。尽管以会议落实会议难以摆脱形式主义之嫌，但这一政治生活的日常景观无疑是观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基层权力运作的重要窗口。对致力于改造农村根据地的中共来说，政策的贯彻执行远比其制定环节重要得多，而村庄正是中共与群众互动的元场所，亦是中共召集会议最多最频、进而使其政策指令落地之处。根据地基层会议既

直观地展示了群众参会意愿和现场表现，亦间接地呈现了群众对中共政策的回应及中共对群众反应之应对。决策、动员、组织、落实是会议的基本功能，会议制度建立和实践的曲折经历折射出中共在理念与实践、政党与群众之间存在的某些距离。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晋西北根据地、基层政权、运行机制、开会

会议系人类有史以来就存在的社会现象。直至今日，其在世界范围内仍是一种沟通交往活动的重要方式与开展领导活动的必要手段。有学者认为，中国所有政治过程均可浓缩为会议这种形式来落实，并指出会议系统主要具有决定、执行和动员的功能。^①因此，会议就渐渐发展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鲜明特征及广大民众对国家政治最直观的印象，及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

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共调查研究表明，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机制在其间得到广泛运用，并与政权层级相匹配形成金字塔型的会议网络，结合政治决策、宣传动员、政策落实等具体革命行动，共同打造了一个根据地基层政权运行系统。因之，开会这一日常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化现象作为集体沟通最直接畅通的民主形式之一，成为中共运用最广泛的基层政权运作模式。某种程度而言，会议的丰富性基于中共的革命实践，中共的历史亦即开会的历史。通过开会，信息得以传递、政令得以发布、民意得达上听，间或亦对既往革命实践中的成败进行经验总结或问题解决，进而使中共各项工作任务得到高效有序推进。那么在此过程中，会议是怎样在民主决策、宣传动员、政策落实、政治导向等各方面与环节发挥具体功能的？中共又是如何利用开会使之成为动员、整合、控制社会力量的重要领导方式的？如何通过会议敦促少数个体的政治参与转向集体的政治参与，令广大基层民众成为中共政治意志的忠实执行者，实现权力自上而下渗透的？广大民众对开会又有怎样的反应？当时的会议是否存在譬如文山会海的形式主义弊病，中共对此又是如何应对与改进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正是学界关注的焦点。

晋西北根据地于整个华北根据地战略意义重大。从区域史角度言之，陕甘宁、晋察冀等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早于晋西北，后者必然或多或少受到前者影响，故将研究空间定于晋西北未尝不可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之效。而且，先前关于根据地的研究多集中在陕甘宁、晋察冀及太行等边区，对晋西北的关注度难以与其历史地位相比。从问题观察视点言之，以开会这一角度切入，不仅可作为透视晋西北根据地基层权力运作机制的视窗，且对于解读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晋西北农村社会在中共革命与日本入侵场景下所发生的激烈变动并揭示中共革命的复杂性与繁难性、反复性与曲折性具有深刻意义，对于深切认识中共革命取得胜利的内在要因亦大有裨益。

一、从组织到会议：基层政权运行的落实体系

^①谢岳（2006）：《当代中国的政治沟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90 页。

村政权是基层政权的基石。从领导方面与工作制度言之，基层政权领导中心在行政村，工作中心则在自然村。因此，村庄既是中共与群众互动的重要场域，亦是中共召集会议最多最频进而使其各项政策指令落地之处。近代社会的集群化让人与人联系日渐紧密，沟通愈发重要，会议变得必不可少。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人重视组织、追求效率，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个贯彻渠道，会议能够有效上传下达，是追求集体主义的中共能够想到的快速下达命令、动员和组织起来的便捷方法。”^①村庄系根据地最小的行政单元，接受来自边区行政公署与县政府的领导。对发生在村庄的会议的考察，不仅使人看到开会作为一种仪式性政治是如何进行表达的，亦可将之视为管窥晋西北根据地基层政权的窗口。因此，下文将以村政权为例阐述根据地基层会议召集情形并试图探讨这些问题：中共召开的会议有多少？会议内容及功能有哪些？中共因何选择将开会作为一种领导方式和工作手段，这样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手段达到了怎样的效果并使开会向制度化、规范化模式转变的？

（一）有多少组织就有多少会议

中共在根据地的会议之所以“多”，与其设立及领导的诸多组织分不开。而乡村社会作为中共治理的重要对象，自然受到密切关注。基于传统社会“中华帝国正式的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与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中央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的减弱乃至消失”的情形^②，对于视农民为统治根基和动力之源的中共而言，如何将之控制在自己政权领导与有序组织下尤为关键。基层政权组织及受其领导的群众组织是中共贴近群众、联系群众的枢纽，特别是村政权下的各种附属组织的建立不仅可以减轻村政权工作负担，亦使更多群众团结在中共周围，既令工作做得更加完善又可教育群众、训练群众和组织群众。^③当然，基层组织建立过程亦是中共权力高度集中和全面下沉进而实现社会形塑的过程。中共正是借助这些基层组织发挥的政治功能才将政令渗透到民众中，让作为革命环节的组织 and 经过组织化的民众团结在其领导之下，接受、拥护并身体力行地支持其一切政治社会活动。中共领导的村政权和群众组织有哪些？以兴县高家村行政村为例，除国民大会和村代表会外，还有村公所所属各类委员会。如常设委员会有民政、财政、文化教育、建设、粮秣、锄奸 6 个，临时委员会有村选指导委员会、减租评议委员会、公粮评议委员会、村款评议委员会、春耕委员会、水利委员会和卫生委员会 7 个。到 1940 年下半年，又陆续成立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等群众团体及其联合组织“抗联”。^④这些群众组织为中共革命提供了一种手段或创造了一种气氛，使得新政权扎根成长。^⑤自然村

①黄道炫（2019）：《如何落实：抗战时期中共的贯彻机制》，《近代史研究》第 5 期，第 72-87 页。

②（德）马克思·韦伯（1993）：《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 110 页。

③《花园沟村政及其上下领导关系》（1942），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A141-1-123-1。以下凡引该馆藏档案者仅标注档案号。

④《兴县高家村调查材料：关于政权问题》（1942），A22-1-15-1。

⑤（美）杰克·贝尔登（1980）：《中国震撼世界》，邱应觉、杨海平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第 591 页

组织建制大体比照行政村，以中庄为例，除设立村代表会、扩干会、公民小组、公民大会外，还设立粮秣小组、招待员、春耕优抗组织、教育组织和其他临时性组织；群众组织则包括妇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工救会和牺盟会。^①村组织如此之多，以致延安农村调查团这样评价道：“村政权的组织不可谓不全矣，真是应有尽有！组织重床叠屋，一人既可称‘会’，亦能成‘组’，不问有无工作内容，一律照样搬到下面。这些名目繁杂的组织，不仅老百姓不知其所为，而且那些所作身为‘某组’‘某会’的也不知自己应做什么事。”^②这些扎根于根据地的基层组织在不断发展根系之时，意识到开会作为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交互的管道，会议的口语化和面对面交流方式绝非书面化文件指示所能比拟，开会渐成为权力运行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下表就是兴县花园沟村 1941 年某月 10 天之中村选工作会议统计：

花园沟行政村村选和各团体选举会议统计表

名称	干部会	群众会	农救会	青救会	妇救会	公民大会	公民小组	代表大会	政务会
次数	48	24	48	24	48	12	23	1	1
人数	384	596	723	108	844	652	985	31	13

资料来源：《花园沟村政及其上下领导关系》（1942），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A141-1-123-1。

据上表显示，各个组织不仅开了会议且次数不少，这只是某月一项工作的会议，而在这月还有其他重要工作亦是非开会不可的。因此，“有多少组织就有多少会”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虽然会议制度的执行是依据工作繁简或多开或减少，但这些组织选择开会的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开会是一种有效的工作机制。鉴于全面性工作是借助开会推进的，村公所规定每月 1 日、16 日召开的干部会是定期的政民混合会。此外，还有上级“开条子”（即发函发文之意）召开的临时会，亦有上级派人来村开会。^③在自然村，一种工作方式是较小和不牵扯到全体居民的事，主任接通知后即协同有关方面直接办理，主任若不能决断则召开干部会决定。另一种工作方式是主任先到村公所参加扩干会，领任务后回村先开干部会，再开群众大会或直接召开群众会。^④因此，全村公民大会既是最高权力机关又是解决一切日常事务的会议，不仅主任代表经常召集村民大会，上级干部亦时常来村召集村民大会。从区政府到行政村，无论晋西抗联还是区农救等……川流不息的来人来团体，他们或为政府工作，或因群众工作，或为与村政权村群众团体无直接关系的个人或团体工作，到村工作的唯

① 《黑峪口中庄村村政权调查材料》，A141-1-107；《中庄群众团体材料》（1942），A141-1-110-1。

② 《柳叶村村政权与群众团体》（1942），A22-1-20-2。

③ 《西坪自然村村政权民运组织与工作及区选领导问题》（1942），A141-1-91-1。

④ 《花园沟村政及其上下领导关系》（1942），A141-1-123-1。

一办法即召开村民大会。^①

其二，开会是一种重要的领导方式。“它的领导功能具有渗透性，它不仅主导政治系统内部各部分的日常运转，它还主导着社会系统的活动方式和内容。”^②区对村的领导用扩干会代替村政委员会，较大事务皆用扩干会指导和布置工作^③；行政村对自然村的领导方式主要经过各种会议，其中以扩干会居多。如兴县黑峪口行政村在村选后召开了6次扩干会，第一次讨论修筑任家湾水利及各村修路筑坝开荒，第二次是征收公粮，第三次是春耕布置，第四次是战时动员，第五次是讨论村款分数，第六次是扩兵。政权方面的单独会议很少，即使开会亦就是摊派。行政村各团体对自然村各团体的领导和自然村各团体对群众是如何领导的呢？扩干会仍是主要方式。前者主要经过村政权召集行政村干部与自然村干事、主任代表（较大的动员工作还召集各小组长及公民代表）开政民扩干会，布置、检查、动员和分工上级下达的任务。譬如，在会议上提出工作办法、分配一定数目按期完成一定程度。有时会安排行政干部与县区来的干部分编小组分配到自然村帮助工作。当然，行政村干部一到村亦是以自然村小组长、干事、小队长与少数积极分子会议的方式传达行政村决议、布置村工作。后者则用扩干会解决一切工作的一切问题，各团体几乎没有单独开会讨论行政村各团体决定的情形。^④

（二）会议制作逻辑与实践脉络

1. 类型与形制

根据地会议形式多种多样，从会议管理学角度区分，大致可分以下几类：从会议参与者可分干部会和群众会，干部会又可细化为村代表会、扩干会、委员会等，群众会则包含公民小组会、全体公民会等。从会议频率可分日常会议、月度会议（制度规定中庄村代表会是一月一次、公民小组会半月一次、全体公民会是一月一次）、季度会议，以及伴随着临时工作召开的不定期会议。^⑤从会议主题可分斗争会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会等，如忻县阳坡村选中的反贪污斗争会、斗地主大会。从召集会议的组织可分财政会议、教育会议、锄奸会议、建设会议、粮秣会议、民政会议、公粮评议会、村款评议会等，这些会议皆分别对应各委员会，承担不同的功能。从会议规模可分三类：小型会议，如村务会议、干部接头会，接头会参与者为村长、副主席、民政会长、农会秘书，这是一个每次在召开较重要大会前皆先行召集的干部讨论会。^⑥这种小范围会议的参与者皆处平等地位，相继在会上发言，探讨具体工作办法，是一种集体决策型会议。中型会议，其相对于小型会议而言，参会者更多关注会上传达的政策

^①《赵家川口调查材料：村政权问题》（1942），A141-1-129-1。

^②谢岳（2008）：《试论会议制度的政治沟通功能》，《学习与探索》第4期，第69-73页。

^③《花园沟村政及其上下领导关系》（1942），A141-1-123-1。

^④《黑峪口中庄村村政权调查材料》（1942），A141-1-107。

^⑤《黑峪口中庄村村政权调查——中庄自然村村政权材料》（1942），A141-1-107。

^⑥晋西区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村选》（1941年12月），A22-1-4-1。

指令，针对这些政策指令提出问题并讨论。大型会议，则如行政村国民大会、自然村公民大会属于参与人数广泛的全体性会议，主要以听报告形式共商有关村庄共同利益的重大事宜。从会议功能分有决策型会议、动员型会议、落实型会议等。须指出的一点是，一次会议可以同时兼具民主决策、宣传动员、政策落实、政治导向等多种功能，根据地基层会议更多倾向于后三种功能。当然，落实到具体会议，会议内容则各有其针对性，发挥不同作用。如扩干会作为一个动员干部会议，与政民干部双方有关的工作要在这一会议上通过，该会并不讨论具体问题而只是动员干部；村务会议是全村首脑，会议起决定作用，有干部反映“一切事情通过村务会”。^①

2. 内容与功能

会议具有集体性，中共的集体主义属性决定了会充分利用之。决策是开会最重要的内容和功能，如行政村村款评议会决定各自然村摊派分配，自然村村款评议会决定每户应摊多少。^②集体决策对减少决策失误、集中民智，使决策获得广泛认同和顺利实施具有积极意义。但需指出的是，根据地基层会议的内容与功能更多倾向于宣传动员和贯彻上级指令，其决策功能则主要用于决定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③

“政府的执行是更为艰巨的任务，落实政策远比制定政策更富挑战性。”^④因此，为数不少的落实会议在根据地频频召开。如上级征收公粮，兴县高家村定下征粮期限 10 天，其中前 5 天的减租活动（减租工作主要是为了配合公粮征收）如下：第一天召集佃户会议先讲一定要减租，第二天召集地主会议解释减租必要性，第三、四、五天地主与佃户会议讨论如何减租，这些会议对于落实上级指令具有极大促进作用。从会议贯彻机制看，大致有两种模式：一是依托政府层级式的行政会议贯彻上级决策，处理日常事务；二是借助开会运用的政治手段和民运组织的会议运作产生的动员作用办理临时性和突发性的重大事务，如征兵征粮之类。^⑤

会议是群众工作的重要仪式。政治生活中的仪式多种多样，但通常有两个功能，一是体现和加强政治权力的权威性，二是显示和提升政治生活的公共面向性。^⑥层级会议体系构成一个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机制，在传递过程中上一层级的权力主体凭借传递代表中共意志的指令确认对下级权力主体的权力行使。同时，开会作为中共权力体系内部实现集体互动的渠道，令少数决策者制定的政策经由多数人的会议讨论具有了权威性与合法性。仪式具有象征意义，而开会的象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①晋西区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村选》（1941 年 12 月），A22-1-4-1。

②《兴县高家村调查材料：关于政权问题》（1942），A22-1-15-1

③具体参见晋西区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村选》（1941 年 12 月），A22-1-4-1。

④胡伟（1998）：《政府过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第 287 页。

⑤《高家村自然村土地租佃部分》（1942），A22-1-18-2。

⑥杨雪冬（2018）：《重构政治仪式 增强政治认同》，《探索与争鸣》第 2 期，第 52-54 页

一是会议变为合法决议的象征，即是否上会系判断决议是否合理可行的依据和标准。所以，村政权建立经常的会议制度，用开会去解决问题，即便并不能完全解决。二是会议是民主的象征，因为召开会议的组织和工作人员皆通过民主选举产生。^①

3. 程序与技术

开会具有一定程序且须一定技巧，才能使会议作用最大化。针对此点，以静乐兴旺庄“‘七七’纪念大会斗争王青云”为例说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会前调查工作不仅可对会议召开条件、效果预先评估，亦可令开会实现“会而有议”“言之有物”的目标。“斗王大会”召开前，干部在深入调查王青云后了解到：政治上，王为达到反动统治目标，时常曲解新法令，借保障人权条例行违抗政府法令之举；经济上，王用兴旺庄一姓村及群众的封建落后性实行经济敲诈和剥削。在这样情况下，全村人对他莫不恨之入骨，基本群众是反对他的，一些中农以上的分子因其贪污等行为深表不满，一些富农地主多受其敲诈。因此，王的错误行为为群众所公认，其压榨为群众所痛恨。这种对立是潜伏着的，遇机即爆。由调查可知，“斗王大会”具备召开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为保证更多人与会和会场情绪高涨，会前动员极其重要。“斗王大会”开始前，针对干部和群众不同形式的动员大会相继召开。首先是干部动员大会，区以上干部5人、村以上干部22人共召开14次干部会，这些会议上对“斗王大会”进行了周密布置，说明斗争意义和与村选工作的关系及胜利的把握，包括斗争中运用的技术策略等。其次是召开群众动员大会，区村干部及积极分子进行家属动员与邻居动员等，在各村公民小组会上，在整理公款公产口号下，提出“斗王”并做了详尽讨论。最后，为保证斗争胜利，锻炼组织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自干部到会员、从兴旺庄到全行政村进行组织动员。其间，分别召开农会会议2次，人数132人，工会会议1次，人数50人，青救会1次，人数50人，妇救会2次，人数42人，每个会员在斗争前必定到场并向群众宣传，以此作为发动群众参加大会的手段。经过上述各类动员会，至“七七”这天参与斗争王青云大会的干部有农会干部22人、妇女18人、儿童27人、自卫队14人、教员12人、士绅地主富农7人，总计118人；各救会员自卫队146人、农会107人、青救会20人、工会117人、学生194人、妇女63人，总计547人；群众男162人、女13人，总计175人。参与人数之多，让老百姓感叹道：“这样热闹与赶会的一样。”^②

（三）农民政治意识与行为重塑

开会中共施展领导才能、强化政党权威的重要手段，其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改变了农民生活状态，令农民在政治生活中的行为发生转变，具体体现在农民意识形态的政治化和农民政治行为的生活化两

^①《桑蛾村政权与群众关系》，A141-1-110-3。

^②晋西区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村选》（1941年12月），A22-1-4-1。

方面。其中，意识形态政治化是对政治身份的认同和对区别于自身的“他者”的认知。农民参会积极性和在会上的表现间接反映出其政治立场，而中共则将阶级区分与政治立场简单对等，并以之重新划分乡村社会等级与确定农民对政权的认同或服从程度。会议是定义一个组织、一个团体乃至一个群体最简便的方式，通过开会，农民区分了贫农、中农、富农等阶级，区别了政治上的进步、落后，对自己和他人的阶级属性与政治身份产生清醒认知，并结合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特别是需要承担抗战负担时所属阶级的不同决定了份额大小的不同，促使每个阶级每个个体逐渐认同自身政治身份。以兴县任家湾各阶级政治分野为例，这是按照各阶级每户政治态度来规定各个阶级政治分野的。进步分子和同情分子占绝大多数，而属于进步分子和同情分子的雇工2户全部都是，贫农和中农绝大部分都是；被动分子中农最多，富农贫农各1户；落后分子中农贫农各1户；中间分子中农富农各1户。其政治态度表现在开会上各有不同：进步分子对政府和军队各种号召积极响应，开会“一吼就到”、“会上能积极发言”，任何情况下对公家无半句怨言或很少有怨言。同情分子接近于进步分子，拥护政府和军队的各种号召，与进步分子不同之处是在会上和一切行动中虽同意进步分子却不像其表现得“积极”。被动分子指对军队和政权既不积极赞成又不反对者，“吼他们开会时常吼不到”，来开会时不肯积极发言，即使发言亦是三言两语说几句不相干的话，甚至有时流露出负面情绪。落后分子是指那些赶不上被动分子且对政府和军队各种动员及号召都不积极者，常常不上会，上会之后唱一些“嗨里困难”“什么都办不到”的调子，与进步分子、同情分子的正确意见相左。他们常同中间分子在一块，有时是中间分子的直接代言人。中间分子是指那些对新政权采取模棱两可态度，甚至有时希望国民党重来统治的那部分人，对政府和军队的一切号召、动员、负担等在迫不得已时才响应。常不到会，怕自己负担得多，来开会时不是“哭穷”就是说些“财主”话。^①

弗朗索瓦·傅勒指出：“革命真正的影响力可能并非它的过程，而是经由这样的过程所型塑出来的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大革命的得失主要还不在于原因和结果如何，而在于一个社会向着它的所有可能性敞开了。大革命发明了一种政治话语和政治实践，从此我们不断地生活于其中。”^②随着中共革命实践全面展开，作为其重要领导方式的开会对农民生活日常及所行所为产生重大影响，不仅“农民话语”出现在政治场域，更重要的是赋予农民日常行为以政治色彩。农民在会议中讨论的皆是政治内容，这些内容与其生活息息相关。他们自身的阶级属性、承担的负担份额、支付的土地租金等，都是通过会议决议的；在会议上选举的民主政府是未来领导他们的政府，商量的村款摊派、公粮征收、春耕优抗、抗属代耕等诸多事项在会后又经过其个人行为得以落实。如在兴县赵家川口，主任代表除与个人

^① 《任家湾底村政权》（1942），A141-1-1-114。

^② （法）弗朗索瓦·傅勒（2005）：《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北京：三联书店，第69页。

利益发生关系的事务不向民众公布外，其他一概要开村民大会讨论。^①生活与政治的边界逐渐模糊，生活是政治，政治亦是生活，开会就是政治生活。借助开会，中共令其政策指示在农民群体中贯彻消化，最终达成将群众对党的认同与支持转化为中共政治优势的目标。

二、干部下乡：下乡干部与基层现场办公会

在传统中国社会，与“皇权不下县”相应的是“行政不下乡”。国家行政在乡村是“悬空了的权力……皇权统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②也就是说，国家行政体系呈现出一种上下分层、中部真空状态，行政机能难以至村，国家意识形态在乡村渗透有限。中共作为一个现代性政党，在具备所有政党共性的同时亦存在特殊性，即中共政权建设始终与底层群众动员相结合。随着中共农村根据地建立，逐渐将工作重心转移至基层社会——争取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使得行政机制浸润到农民日常生活及心理中，领导、组织、动员群众无疑成为其重要工作内容。就乡土社会而言，实现这些目标的渠道之一即派遣工作团和干部下乡领导工作，这些干部是“政权与群众的分界点”，是打通国家与乡村精神通道的牵线人。^③这一工作特点在战争时期形成并为中共全面执政后所继承和制度化，国家对于农村的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在相当程度上依靠下派工作团。^④

（一）干部下乡与中共意志的乡土渗透

中共改造根据地基层政权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能够反映自身意志且行之有效的政权运行机制、一个行之有度且忠诚可靠的干部支持体系。代表国家意志的干部下乡指导工作，将政治信息传递到基层，间或反馈吸纳群众意见，润物无声地实现国家权力在乡土社会下沉，潜移默化地转换群众的个人意志为集体意志，逐渐实现思想、意识、行动在群众中的统一。干部下乡显然是一种有效的工作方式，“要想各自然村工作做得好，只有村级干部多向自然村跑，帮助代表们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同发生的困难。”^⑤同时亦是一种重要领导方式。鉴于根据地上下级干部间的领导关系基本呈现单向的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干部下乡结合召开会议、文件指示就成为这种领导体系的具体表现形式。^⑥

上级机关在一定时期有一定工作布置，名曰“中心工作”或“突击工作”。随着工作布置的传达，

①《赵家川口调查材料：村政权问题》（1942），A141-1-129-1。

②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3页。

③《西坪自卫队群众大会记录》（1942），A141-1-91-2。

④徐勇（2007）：《“行政下乡”：动员、任务与命令——现代国家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行政机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第2-9页。

⑤《桑蛾村政权与群众关系》（1942），A141-1-110-3。

⑥岳谦厚、董春燕（2009）：《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研究》，《安徽史学》第1期，第35-44页。

一级传一级直至自然村，各种不同名目的“‘工作团’像风一样地吹遍”各行政村各自然村，如公粮、村选、区选、农选、武选等。^①或是新发动的事情，如新文字运动、村摊款等，都是上级派干部下乡主持工作。这些工作具有突击性质，每次半月十天或一月不等。^②各自然村在接受工作布置后，通常是村干部到行政村参加代表会或扩干会。会上，首先是区或工作团来人传达，之后代表和代表主任就回到自然村。如上边来人较多时就随各村代表到各村帮助工作；如人手不足时则由这些人将所要传达的大纲写好交与各行政村干部，村干部带着提纲来各村帮助工作。换言之，一切事情均可由上级来人负责，群众工作传达、问题解决甚至会议主持都是上面来人。^③如村选在兴县柳叶村进行了7天，第一天是区上来人在行政村召开扩干会布置，出席会议的有6个下乡干部和本村区长，当天会议是上边来人报告选举意思及办法后就分头下乡工作；第二天，上级派了两位干部到柳叶村帮助召开群众大会，会上宣传民主如何重要并聘请张进升为国民大会主席；之后几天陆续开会以推进村选工作的完成。^④下乡干部除到自然村帮助工作外，有时在自然村的会前会议中常鼓励大家“民主的提意见”，以便为大家“彻底的解决困难”。如西坪村干部处理村摊款工作时遇到“不识字、数目太零碎、记起账来没法办”^⑤的问题就是通过群众和村干部开会时向上级干部反映解决的，有时这些下乡干部在会后还要召集干部做一些具体的“组织工作”。^⑥另外，鉴于行政村干部遇有较大工作才到自然村，因而不问党政军民什么工作都做，主要是动员工作。他们一到村仍召开自然村小组长、干事、小队长与少数积极分子会议传达行政村决议、布置自然村工作。^⑦“村长及村一级干部下自然村视察工作”^⑧亦是上级干部下乡的原因之一，哪一个团体人去哪一村哪一村组织工作就做得好一点。^⑨因此，干部下乡同时被赋予党内巡视与监督的职能。

这些下乡干部在工作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勤恳努力，除开会外下乡帮助花费其绝大多数精力和时间。如在柳叶村4位干部中，除郭改肴不下乡外，其他3个都是下乡干部，和其他下乡干部一样是“忙得屁股坐不下”。^⑩干部的吃苦耐劳精神到处可见，凡属参加公粮工作的干部几个通宵不睡觉是极普通的现象。¹¹行政村干部有时因自身繁忙会下来“拉夫”，把一些委员“拉”到别的自然村去帮助工作。

① 《任家湾底村政权》（1942），A141-1-1-114。

② 《西坪自然村政权民运组织与工作及区选领导问题》，A141-1-91-1。

③ 《任家湾底村政权》（1942），A141-1-1-114。

④ 《柳叶村村政权与群众团体》（1942），A22-1-20-2。

⑤ 《西坪自然村政权民运组织与工作及区选领导问题》（1942），A141-1-91-1。

⑥ 《任家湾底村政权》（1942），A141-1-1-114。

⑦ 《中庄群众团体材料》（1942），A141-1-110-1。

⑧ 《桑蛾村政权与群众关系》，A141-1-110-3。

⑨ 《中庄群众团体材料》（1942），A141-1-110-1。

⑩ 《柳叶村村政权与群众团体》（1942），A22-1-20-2。

11 晋西区党委：《经济建设材料汇集——公粮》（1941年12月），A22-7-7-1。

如区选时，行政村干部到赵家川口村召集村民大会完成任务后，顺便就将该村主任代表赵全愈拉到石阴、吕家湾、冯家庄等村进行区选工作。赵全愈一去就是4天，第五天还陪同行政村干部到高家村汇报工作，第六天才回来。据他说：这样下乡帮助工作平均每月1次，每次5天左右，仅1942年1月至5月就下过3次乡。^①

中国传统社会自上而下金字塔式的行政体系止于县一级，且县级官员均是皇帝委派的外来人，这种官员配置方式尽管能保证地方官员忠于皇帝，但隔绝了基层政权与普遍民众的联系。^②抗战时期，为了能够建立起忠于中共的干部行政体系，下乡干部不仅要在短期中“完成一个动员工作或是突击工作，另一方面在工作过程中发现积极分子培养干部。”^③经过下乡干部甄别遴选出来的积极分子成为后备干部的同时，亦是基层干部组织的重要成员。因此，这些新生干部的权力来自于官方确认而非个人活动——他们凭借与中共的关系“似乎更容易通过自己的勇敢行为获得村民的尊重，也容易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培养下，获得从前根本无法获得的从政经验和知识，从而具备变成新精英的条件。”^④工作中，他们向上沟通民情、传达民意，较外来干部更了解当地治理经验与基层情况；向下传递信息、贯彻政令，代表中共意志紧密联系群众，所以常会看见群众大会到会者无干部到会者多的现象。^⑤下乡干部勤勉的工作态度，加之多次下乡触摸基层群众脉搏的行动力，不仅完成了动员群众的工作，亦做了组织群众的工作。如慰问团到兴县高家村后发还被没收者土地、召开士绅会议等行动，既安定了地主恐惧无措心理，亦改变了前期极端仇恨新政权的态度。^⑥1941年晋西北行署重新制定了较过去更科学的公粮征收办法，为帮助柳叶村完成公粮征收任务，上级派了很多干部到村。^⑦在公粮征收过程中，下乡干部不仅通过鼓励和诱导等方式动员群众主动上缴公粮，促进群众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亦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政治实践活动将群众组织起来，发展壮大中共力量。就自然村村干部而言，下乡干部给了其相当教育，确实在帮助政府工作上起了大作用。^⑧

（二）一个村庄的现场办公会

根据地基层现场办公会具体情景怎样？干部下乡如何召开会议？是否辅助了自然村干部工作？干部下乡的工作方式是蜻蜓点水抑或下马赏花？这些均是对基层现场办公会进行动态考察的原因。想

①《赵家川口调查材料：村政权问题》（1942），A141-1-129-1。

②徐勇（2007）：《“行政下乡”：动员、任务与命令——现代国家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行政机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第2-9页。

③《黑峪口中庄村村政权调查——中庄自然村村政权材料》（1942），A141-1-107。

④张鸣（2001）：《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第211页。

⑤《柳叶村村政权与群众团体》（1942），A22-1-20-2。

⑥《兴县高家村调查材料：关于政权问题》（1942），A22-1-15-1。

⑦《兴县柳叶村公粮村摊款田赋》（1942），A22-1-21-1。

⑧《中庄群众团体材料》（1942），A141-1-110-1；《柳叶村村政权与群众团体》（1942），A22-1-20-2。

要深入对会议进行研究，就要走进会场，置身于当时的历史情境。因之，笔者在此选取了一个村会议记录，其较完整地呈现出整个大会过程，可以借此作为认识基层会议与政权运行的视点找到了解上述问题的路径。

“村政权的一切工作活动主要表现在村的干部会和群众会上。”^①换言之，各种主题、各种内容、各种形式的会议在根据地屡见不鲜。这里选取唐家吉村 1942 年 5 月间村选区选实景记录为例说明，这尽管只是诸多会议中的两次，却呈现了当时的开会场景并展示了下乡干部工作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②

1942 年 5 月间的村选

兴县二区为本年各地区选实验区。

声明：本次村选我们亲身参加，现将选举情形作一忠实的报道，优点这里不谈。

选举前的工作：五月二十七日主村介绍政干校王××（原文如此，下同）到唐家吉进行区选，并派有主村武委会主任白××协助。当天晚上王、白二同志即召集村干部开会。先由王同志说明这次区选的意义，以及选举的办法，王同志发言毕，白同志讲话，要求干部们向群众解释，干部们起模范作用……干部发言的很少，白天做了一天活，于是在睡声大作中散会。

第二天组里开会，讨论全村人口、外出人口等并分配干部协助登记，最后讨论开会方式和地点。主任代表发言：“明天下午在米家院里开看呱的个？”“行！”干部们毫无意见的通过了。“各动员其婆姨都到会，不来不行。”主任代表再三叮嘱。会散了。

第三天一整天武委会白同志去亲戚家里，王同志早起将去年村选时选民登记册补了一下，午间就大睡其觉。干部和群众都上地去了，有的到黑峪口去赶集，村里没有一点选举的气息，就这样要开区选大会了。

区选大会情形：原先说的下午饭后就开会，但直到太阳快落山时会才召集起来，前后光吼人费了两个多钟头，然而村子并不大，只有二十七人户家。

全村男女人口共一百一十三口，除过没有选举权的小国民外，应到会的有七十左右，可是实到会的仅只有三十挂零，小孩几占去五分之一。

全场坐的像战斗了好几天疲乏不堪的伤兵，有几个干部长长的躺在地上，一个还躺在牛槽里，小孩的嬉戏声和妇女们的家常话充满了会场，就这区干部在报告着区选的意义，声音好像午夜的水声，在狂风的狂叫中时隐时现。

①《任家湾底村政权》（1942），A141-1-1-114。

②《唐家吉村政权问题的调查材料》（1942），A141-1-125-1。

“区选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选好区长，不选坏人，选举时大家都能提候选人，不限村与村、主村与主村、区与区，提的时候把他的优缺点介绍一下，什么优点、什么缺点。”

“还有，代表到主村去竞选时还能提人。只要凑够三十人，就可提出候选人一名，当场参加竞选，就这了，现在大家提候选人。”

全场暂时沉寂了，不要说话，听人家说。

首先是主任代表刘仁柱提“我提桑蛾村刘述敬，大家看咋的个？”“行！”干部们吼了一声，声音很大，连牛槽里躺着的武委会小队长也惊醒了。——第二个提候选人的是冯秉信：提黑峪口白佩贞，白佩贞各样都好，大家看咋的个？”“那个人海哩能办事！”代表任然怀补充了一句。“同意！”干部们又是一声。妇女们说着自己的家常话，小孩子在会场里追逐撕打。——第三个是主任代表任然怀提的，也是黑峪口人。“那是一个爬场”，一个干部说。“尿！”一个干部唾了口唾沫，很轻蔑的觉得“爬场”中是没有提出当候选人的资格。

“他能办甚事？”一个干部很不以为然的问。

“人家还教过书，现在黑峪口教书哩！”任然怀补充了自己的意见。两分钟后，没人说话，这个提议就算流产了。

最后是武委会老年兼壮年队小队长刘世禄提的黑峪口一个小商人。“人家的文化资格都够了，大家看咋的个？”“行！”还不等群众说话，干部们又通过了。游击队员贫农宋耐恒小声小气不在意的说：“就是爱搭两个钱，将来选上就不能那个了。”提议人刘世禄脖子扭着，宋耐恒再没敢说话。

“没人提啦，就这四个吧！”区干部站起来，“现在说优缺点吧！”“说尿个甚哩！”不知谁小声说了一句。一个老太婆坐着不耐烦要回家吃晚饭，当然的“同意”，全场都笑了。

“刘述敬过去当兴县财政局科长，有能力，对人还老实，我看就可以。”主任代表刘仁柱就算介绍了刘述敬的优缺点，下来就再没人介绍。不知老百姓是反不转，还是区干部没解释清楚。

“三个人就算通过了。”区干部下了最后的结论。

现在提议案，干部们都莫名其妙的瞠目起来，有些群众恐怕从来没听过这样生疏的名词。“议案就是对政府的意见，对今后新区长的意见。”干部解释着。

“没啦个！”

“唉！我有个意见，就是我那公粮村上要米，咱没米，有几斗黑豆看能不能交。”宋耐恒提出自己的“议案”。“你交过没有？”一个农民问。“交过，村公所人家不要，上次背去又背回来。”“尿！人家叫干甚哩，你说尿的甚呀！人家管你这些了！”主任代表用着教训的口吻。“呱呱”代表干部们都笑了，主任代表笑得更厉害。

“就这了，还有一句话，二十八日在区上选举区长时，老百姓也能去，村上还给管饭唱戏。”区

干部结束了最后的一句话，人像潮一样的从小门里涌出，区选大会就这样结束了。

根据上述材料，可以看到该村选区选开会中存在的问题：区干部召集村干部开会分配任务、讲话动员，村干部无说话机会而俯首领命；村干部自己商量提人、包办，群众无说话机会，当然地通过；有钱人可大讲其话甚至演讲，没钱人说说话就要遭受到“尿”“你懂尿个甚”的回击；区干部动员村干部，村干部动员自己，老百姓没人去动员；区干部满口名词，老百姓瞠目不解，在区选中表现得尤为沉寂。^①

（三）下乡干部的所作所为及结果

干部下乡帮助基层工作是中共的一种重要领导方式。每逢有行政工作，上级干部开过扩大会就到各自然村帮助工作。^②因此，上级来村干部被称作“下乡干部”。区干部及工作团下乡是下到自然村，行政村许多工作则直接将政民干部动员起来下到自然村。基本上村稍大一些的工作主要靠上级干部下乡推进，一年里中心工作到来之时亦是区干部“磨穿鞋底忙不过来的时候”。^③这直接导致下乡干部到了自然村变成包办一切的“钦差大臣”，而村干部成为“听差”。^④上级来人或工作团说要办公粮就帮办公粮，要贷粮贷款就帮贷粮贷款，其他无权过问，甚至面临干部下乡不与主任代表商议而独自开会的情形。^⑤柳叶村村选时被聘为国民大会主席的干部称，开会时仅负责“婆姨抱娃娃来了，不让娃娃哭，不要乱说话”的工作。再如征粮时区上派来的干部在群众大会上征求百姓是否罚张进升 10 石公粮，会上因无人表态，一位党员说了一句要大家表态的话，反令这位区干部把笔一摔气冲冲离开会场。上级干部到村说一不二，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将政权的强制作用发挥到极致，即对参会者说“你们怕开会偏来开，你们怕训练偏来训！”“你们不好好听，今天开一通夜的会！”^⑥下级干部不得不勉强当傀儡，另则因上级干部包办代替心存不满。^⑦如武委会开会不让主任参加，中庄村主任代表刘效玉讽刺说：“人家武委会开会我们去干什么。”^⑧

加强下层领导、培养下层干部并使积极分子成为真正的群众领袖，惟经常下乡巡视检查不可。^⑨然

①《唐家吉村政权问题的调查材料》（1942），A141-1-125-1。

②《柳叶村村政权与群众团体》（1942），A22-1-20-2。

③《兴县高家村调查材料：关于政权问题》（1942），A22-1-15-1。

④《柳叶村村政权与群众团体》（1942），A22-1-20-2。

⑤《赵家川口调查材料：村政权问题》（1942），A141-1-129-1；《中庄群众团体材料》（1942），A141-1-110-1。

⑥《柳叶村村政权与群众团体》（1942），A22-1-20-2；《西坪自然村村政权民运组织与工作区选领导问题》（1942），A141-1-91-1。

⑦《兴县高家村调查材料：关于政权问题》（1942），A22-1-15-1。

⑧《中庄群众团体材料》（1942），A141-1-110-1。

⑨《唐家吉村政权问题的调查材料》（1942），A141-1-125-1。

“村公所对自然村工作的检查是很少的，自然村与行政村的报告也很少。”干部下乡“不管是行政村、自然村都只有会议上的工作布置，而没有按布置一次一次的检查”^①，就好像只要能达到目的，如何开展工作及效果如何无关紧要。^②于是，村干部逐渐养成“催得紧办得紧、催得慢办得慢”“谁在跟前谁办”应付公事得过且过的习惯。如上边来人就开会，不来则不开；事情都堆在主任代表“跟前”，“不商讨、不集体、不开会，各部门之间也不联系。”^③由此，行政村诸多重要决议在自然村打了折扣，有时议而不行，有时仅自然村主任知道却未深入群众；群众中发生大问题，干部亦没有召开干部会议适当解决。如开荒问题，好多无地的人不了解法令，地主夺地几户，佃户不清楚，干部不设法解决；甚至干部知道公民有违法行为，非但不迅速解决反任其自流。如中庄村村民任则宾、任效芝等召集赌徒昼夜赌博，任效芝之妻抓拿赌具并报村主任，主任对此未加批评或召开会议教育处罚赌徒以避免赌博流行，耽误群众生产生活。^④于群众而言，“把我们的干部看成只知乱干、没有能耐、只是开会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没文化’人”，除全力注视干部活动外，他们自己推选出来不起作用的干部很自然地变为摆设。^⑤

另外，下乡干部工作制度本身即规定了其须经常在村工作，形成“周期性工作制”。^⑥这种临时性质的工作制度很大程度造成前后工作不衔接。如下乡干部在兴县冯家山遇到这样的情况，即征收公粮时一户佃户减了租而地主不让种地的事。村选时佃户提出来而这位干部说：“咱不知道，你去找老张（指征公粮时的下乡干部）吧！”以“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的大话所接受的问题却事到临头不能解决；再另换一位时又对这个问题茫然不知，推三阻四。^⑦下乡干部忙碌于不同村庄，变换工作时既不了解又不熟悉情况，结果只将上面的布置计划——不管对区或区对村的，不管参加这些会议的是干部抑或百姓均照样背诵一次。据说这还是“强”的干部，如是“弱”的则对于上级这种“周密”的工作布置只就记得传达且多有遗漏。^⑧甚至据调查材料显示，上级干部在会上报告的内容充满了“把握政策、贯彻深入、中心环节、多方面、各种方式等”不易为村干部接受的词句，完全没有考虑某些自然村干部文化水准极低的情形。^⑨兴县中庄村虽半文盲比过去增加，过去6个干部有半文盲1个且占不识字的16.7%，现有9个干部中半文盲4人、占不识字的44.4%，实则普遍的法令指示对其来说是难以理解

①《黑峪口中庄村村政权调查——中庄自然村政权材料》（1942），A141-1-107。

②《兴县高家村调查材料：关于政权问题》（1942），A22-1-15-1。

③《西坪自然村村政权民运组织与工作及区选领导问题》（1942），A141-1-91-1。

④《黑峪口中庄村村政权调查——中庄自然村政权材料》（1942），A141-1-107。

⑤《黑峪口调查：文化教育》（1942），A141-1-97。

⑥《兴县高家村调查材料：关于政权问题》（1942），A22-1-15-1。

⑦《柳叶村村政权与群众团体》（1942），A22-1-20-2。

⑧《任家湾底村政权》（1942），A141-1-1-114。

⑨《兴县高家村调查材料：关于政权问题》（1942），A22-1-15-1。

的。^①下级干部常反映“开会容易不麻烦，就是有的听不懂记不住。”这一方面决定了其“有样学样”，依据上级干部示范在开会时照搬教条式的政治术语。比如“脱裤子”，上面这样叫，村干部亦这样叫，实际怎样一回事村干部不清楚。另一方面，村干部因对政策不了解而对政策执行不明确，以致对政策不执行乱执行。如减租工作不按规定执行，对地主富农及部分富裕中农歧视，不尊重民主制度，甚至打人押人、擅自罚款，使团结各阶级的政策遭受窒碍。^②

综上所述，中共以干部下乡方式实现对基层干部领导之时亦实现了“政党下乡”，而贯穿在整个下乡过程中的现场办公会则形成一条有益于政令下行和民意上达的沟通渠道。上级干部在下乡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应在领导上摒弃上级的主观要求，工作上吸收群众意见并深入群众；检查下级工作，实事求是地给群众解决切身问题；培养自然村干部的工作能力与领导作用，争取并教育这些干部使之为新民主主义政权忠实服务；在组织上取消繁琐程序和形式主义。^③因此，下乡干部的基层工作经历之于其本身是一种锤炼，其指导下级干部的过程亦是自身再次熟练工作的过程。基层干部在下乡干部帮助下得到实践锻炼，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文化素质、行政能力、革命意志与党性原则的提高。当然，在干部下乡具体实践中不免出现包办代替甚至党政界限不分、不解决群众实际问题却强迫命令、照搬法令条例而布置工作老套、总结工作不及时与八股化等工作形式大于内容或只有形式而无内容的问题^④，以致于令基层干部工作积极性无法张扬而有损于下乡干部威信建立、助长下级干部工作能力提升乏力又削弱其在群众中领导作用的现象，但于整个基层干部行政体系的建立来说则“瑕不掩瑜”。^⑤

三、“共产党会多”：基层民众释放的群体应音

开会中共革命实践中的作用巨大。对于传统农民而言，聚会多在逢年过节时于本族、本乡、本村中举办，日常性公共聚会较少且基本不具政治色彩。随着中共以军队组织的形式进入广大农村地区，不断开辟抗日根据地，“军事——政权组织开始用‘任务’的方式影响和支配农村社会。首先是将传统国家下派的赋税改变为‘公粮’，要求农民完成一定数量的粮食征收任务。其次是行政性工作任务的开始通过党、政权、群众组织等组织系统下达到农村社会。”^⑥这些任务抑或行政指令绝大多数以开会方式落实。因此，开会这一现代政治形式逐步运用于农村，以致“上级干部到了村里过一年没有开会，

①《黑峪口中庄村政权调查——中庄自然村政权材料》（1942），A141-1-107。

②《兴县高家村调查材料：关于政权问题》（1942），A22-1-15-1。

③《西坪自然村政权民运组织与工作及区选领导问题》（1942），A141-1-91-1。

④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98）：《晋绥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第39页。

⑤《西坪自然村政权民运组织与工作及区选领导问题》（1942），A141-1-91-1。

⑥徐勇（2007）：《“行政下乡”：动员、任务与命令——现代国家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行政机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第2-9页。

老百姓就会诧异起来窃窃私议‘怎么还不开会了’，仿佛干部下乡而不开会不合理似的。”^①通过开会，中共意志得以在基层民众中贯彻，民众个人诉求亦在频繁反复的会议中转化为中共意志。若将农民置于历史舞台的中心，视开会为一道中共与群众互动的桥梁，从农民视角出发，考察其对开会的因应及折射出来的内在动因，对于挖掘中共革命的真实面相、探讨普通农民在革命战争环境下的政治与生活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一）普通群众的理性反应

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会议往往会上谈论的内容基本与其利益诉求相关，这极大地促进了其开会的热情，“他们觉得这才是在开自己的会，讨论和解决自己的问题”，即便“不喊什么彻底发扬民主等调头，但他们觉得这就是在运用民主。”如村代表主任工作中遇到某种困难或上面派下的差事行不通时，会召集干部会或群众会。因为，这种会议无论对村干部或群众（如动员、派差等问题）而言都是在工作需要情况下召集，故大家只要知道则差不多都能到会。尽管会议没有上面来人主持，却开得生动活跃；没有多少点若干条全面不漏的工作报告，但大家讨论得很起劲；不说什么大家提意见、给大家解决问题，而大家总提出问题且会求得某种程度解决；“公粮工作进行几乎完全是在各种会议上进行的……每天都短不了开会……前一二天是开会让群众自报收成”，因征粮关系农民自身负担轻重且为避免“假报使这个自报收成会议陷于无用……群众倒是非常关心，在秋收忙碌情形之下参加都很活跃。”^②如“高家村自然村反假报斗争的群众大会上大家情绪都很高，开了一整夜没完也没有谁偷走。”另外，鉴于开会与上级所分配的动员计划联系紧密，群众是否能够主动参与到会议中并接受组织动员，与会议召集人在会上的语言表达方式及是否适时掌握群众情绪关系很大。如“在自然村公民小组会上由区选工作团普遍的发动‘田家会胜利慰劳运动’，在高家村3个公民小组会议上都提出来，结果一致碰着了老百姓的冷淡回答。最初调查团以为是老百姓不关心与吝啬，事后在村代表自己召开的会议上面他们不但踊跃募捐，其互相督促程度、对军队打胜仗后的心情都表现很好。如果最初不是由区选工作团同志提、不是像石主任提出的‘要一个猪’，也许在公民小组上还是会一样热烈的。”^③虽然有时群众对开会表现出积极主动参与的态度，但亦少不了“总要‘吼’了再‘吼’，花费两三个钟头的时间才能‘拉’到一些人”^④，且在会上“大家面面相觑、默无一言”^⑤“妇女们说着自己的家常话，小孩子在会场里追逐撕打”的现象。^⑥

①《赵家川口调查材料：村政权问题》（1942），A141-1-129-1。

②《任家湾底村政权》（1942），A141-1-1-114。

③《兴县高家村调查材料：关于政权问题》（1942），A22-1-15-1。

④《任家湾底村政权》（1942），A141-1-1-114。

⑤《柳叶村村政权与群众团体》（1942），A22-1-20-2。

⑥《唐家吉村政权问题的调查材料》（1942），A141-1-125-1。

群众想开会吗？在“旧政权时代也很难说到底是怎样具体的领导。据我们的调查（延安农村调查团），在旧日很少召开会议，半年还不知道有一次没有，不召开会而唯一的办法就是一级向一级下命令，下命令写通知限定日期完成，假使不这样照办即刻就要受到干涉”，群众难以参与到政治生活中。

①而“今天的新政权是拥护广大群众的利益”的，特别是“代表会议是全村行政会议的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小组直接领导农户。遇事除代表会议讨论外，得在公民小组展开深入的普遍的讨论和宣传。这与历史上的村头、村副、闾邻等各种制度根本不同”，②“不开会不民主”③，开会则使千年以来被隔绝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乡村民众迈进国家权力体系，“人民开始享受到抗日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生活”④，又怎会不乐意于参会呢？反之，大致有以下原因：

首先，农民“在经济生活中愈显得积极，则愈益束缚着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开展。”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是充分关切“穷苦群众的利益的，它减轻了穷苦人民的负担，尽可能的改善了他们的经济条件（如减租减息、禁止夺地、回赎不动产等），这就使他们得到了发展自己经济的一些可能，而事实上有些人已经在新政权建立的两年中得到某种发展了。”⑤然在此经济利益导向下，农民以各种理由推脱开会，何况“政府一直向农民要得多给得少，保护他们的法令政策未彻底执行，除了直接获得利益的部分基本群众外，其余大多持冷淡不关心态度。农民虽然知道新政权是好的，但他们说不出好在什么地方，且一些负担支差事实容易使他们模糊对政府的印象。因此，农民无论村选还是区选他们都不积极参加，对政府一些政策法规也只是奉行态度。”⑥“他们觉得与其在政治上发展自己，还不若趁着这个有利时机来发展自己的经济。”毕竟经济追求的是效益，开会不能养家糊口。调查资料显示，“群众在政治上最关心的是抗战负担问题，但贫农（雇工、贫民在内）一般不出负担或很少出负担，因之对于这类的会议他们常不肯参加，即使参加了也感到无兴趣，反不若给自己多做点‘活’、多在地里‘刨闹’‘刨闹’对自己更有利些。”⑦

其次，开会频次过多，会议时间过长，很大程度导致“老百姓开会开疲了，把会当作痛苦负担，而一心只在劳动和休息”。⑧中庄村公民大会就因“会召集的太多了，同时又是占去很长时间，白天就要费半天，晚上开就要废半夜工夫”，以致“全村共 105 个公民，召开公民大会时到会的只有 30 人

①《桑蛾村政权与群众关系》（1942），A141-1-110-3。

②《任家湾底村政权》（1942），A141-1-1-114；《唐家吉村政权问题的调查材料》（1942），A141-1-125-1。

③《赵家川口调查材料：村政权问题》（1942），A141-1-129-1。

④《唐家吉村政权问题的调查材料》（1942），A141-1-125-1。

⑤《任家湾底村政权》（1942），A141-1-1-114。

⑥《兴县高家村调查材料：关于政权问题》（1942），A22-1-15-1。

⑦《任家湾底村政权》（1942），A141-1-1-114。

⑧《赵家川口调查材料：村政权问题》（1942），A141-1-129-1。

左右。”^①“抗战初期群众抗日情绪高涨，群众团体曾组织动员他们开了很多很大的纪念会、检阅会，最初群众还愿意参加，后来老是这样开会，群众仅因害怕不去有罪因而勉强服从”，开会效能大打折扣。^②由此观之，如果开会的成功建立在无限制扩大时间和增加会议频次基础上，“就会导致开会成本大于成果，这种无效的开会方式不仅浪费了组织资源，而且使参会者身心疲惫，是政治运作非人格化的显现。”^③

再次，“主村开会的干部只愿‘发表’一通，不肯照顾群众并发动他们提出问题而就事论事解决问题”^④，甚至常带着一大堆任务下来以“公家人”资格替政府办事向群众索要而不了解群众生活及要求、不替他们解决问题而只站在他们之上发号施令，那么虽有好的口号则只能成为空谈，这就导致政权工作与实际群众工作脱节。这种情况下，群众很难认为这些干部是自己人、是给自己办事的、是群众的领袖，且开会时“‘大点套小点’，小点又分一、二、三、四可以列到‘无其数’……满口的术语和句句的新‘名辞’”，毫不考虑群众听不懂其教条式枯燥艰涩的讲话，导致群众在开会过程中普遍产生厌烦情绪。正所谓“到‘教堂’里去的人都知道他们是要去‘听经’或‘做礼拜’的，然而来参加这种会议的老百姓却不知道为什么来开会和人家在讲解什么东西的。”^⑤

最后，干部开会“一言堂”的包办方式垄断了群众话语权。高家村公粮评议会就是典型例子。该村“公粮数字修改没有经过评议委员会而由区干部私自改了，评议委员会不起什么作用，一切工作由上头干部、由工作团包办，老百姓也知道。”^⑥在中国传统社会，行政体系长期处于自我运行的封闭状态，群众作为政策被执行政者没有亦不可能被纳入国家行政体系轨道。而中共想要夺取政权，动员底层群众参与政权建设，就须解除广大乡村民众在行政体系中的失语状态，予其在政治生活中当家作主的权利。想要达成上述目标，中共一方面须启发民智，这里的民智不仅指知识文化水平，更重要的是促进广大民众参政意识的提高。就像中庄村公民小组会，群众可以发言和讨论问题，而不像在大会上那样死板。^⑦另一方面，中共须不断促进基层干部在民主二字上“知行合一”“干部不知道运用民主，不会运用民主，有事干部们私下商量”，开会时群众只能说“行”或“通过”^⑧，这样的“民主”会议既“削弱了民主的发扬（老百姓懒得在会上说话），也多少加重了村民的负担（时间浪费）。”^⑨即使群

①《黑峪口中庄村村政权调查——中庄自然村政权材料》（1942），A141-1-107。

②《兴县高家村调查材料：关于政权问题》（1942），A22-1-15-1。

③王环环（2011）：《乡村基层政治运作——以开会为视角的分析》，《社会主义研究》第1期，第104-109页。

④《赵家川口调查材料：村政权问题》（1942），A141-1-129-1。

⑤《任家湾底村政权》（1942），A141-1-1-114。

⑥《兴县高家村调查材料：关于政权问题》（1942），A22-1-15-1。

⑦《黑峪口中庄村村政权调查——中庄自然村政权材料》（1942），A141-1-107。

⑧《唐家吉村政权问题的调查材料》（1942），A141-1-125-1。

⑨《赵家川口调查材料：村政权问题》（1942），A141-1-129-1。

众出于某些原因参会，其口中敷衍的“行”或“通过”在执行中会产生诸多问题，往往大家通过的东西在实践中行不通。^①与此同时，开会在动员群众方面的效果亦适得其反。对群众而言，这样的“民主即是‘抿’住嘴不能开”。^②

（二）党政民干部的内在体验

每逢工作量较大，如村选、春耕、区选，鉴于开会省时省力的优点，干部普遍将之视为一种日常的工作方式。^③如把行政村扩干会、自然村干部会及群众大会当作完成一切工作的“三个环节”，那么不论什么工作总会步调不紊地开起会来。这种完成工作的“三部曲”，有许多干部都是从头至尾的演奏者和倾听者。^④有干部反映：“在开会之始，只是听一听，对自己有好处，还没有整自己的意识，所以第一天马马虎虎听，在准备发言之后，态度不同了，同时会议上的发言，对自己有了启发……参加这次会议，我觉得对我比其他同志教育教育特别多。”^⑤亦有干部出席政权代表会议后意识到开会在反映群众团体意见、协商群众团体在行政分工等环节起到得良好作用，不仅减轻了主任代表工作，亦减少了不必要的繁冗干部，使政权与民运能够很好配合。^⑥基层干部对参加诸如此类的会议抱有积极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厌烦情绪，而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

首先，开会时间选择不当，会议时间过长。处于农忙时节的干部即便有心开会，白日辛苦劳作早已身体疲惫。此种情况下，通宵开会再结合参会领导“轮番讲”“反复讲”，使得会议在下级干部鼾声中散会就不难理解了。^⑦何况干部本身承担着多项工作，而开会仅其一。以主任代表为例，诸事压在身上，让其一天忙到晚。一个主任代表要催收村摊款、催办公粮、应酬招待过往人员及本村驻军机关借东西要东西，还要应付上级派来的工作员、帮助召集开会、上级要调查材料报告、谈话应付村公所召集的各种会议等。^⑧这其中开会即占干部全部工作的大量时间。据西坪政民工作所费时日表，仅1941年7个月中开会受训就占了村干部全部工作时间的五分之一。^⑨由于各村“村长、副主席、民政会长等一个月开会总有二十天以上，忙得一塌糊涂。”^⑩所以，“高家沟的阎长像派差一样轮流担任，一年之间换了6个阎长，每人平均两个月，后来村公所不准许，这个办法才停止。”¹¹工作内容多、工作量

①《唐家吉村政权问题的调查材料》（1942），A141-1-125-1。

②《黑峪口中庄村政权调查——中庄自然村政权材料》（1942），A141-1-107。

③《兴县高家村调查材料：关于政权问题》（1942），A22-1-15-1。

④《柳叶村村政权与群众团体》（1942），A22-1-20-2。

⑤《军区第×小组意见》，《晋绥学说》1943年5月15日第4-5期合刊。

⑥《唐家吉村政权问题的调查材料》（1942），A141-1-125-1。

⑦《唐家吉村政权问题的调查材料》（1942），A141-1-125-1。

⑧《黑峪口中庄村政权调查——中庄自然村政权材料》（1942），A141-1-107。

⑨《西坪自然村政权民运组织与工作及区选领导问题》（1942），A141-1-91-1。

⑩晋西区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村选》（1941年12月），A22-1-4-1。

11《花园沟村政及其上下领导关系》（1942），A141-1-23-11。

大，让干部每每开会时“心有杂念”，同时增加了工作上和心理上的负担，让群众对成为一名干部产生抵抗情绪。^①

其次，会议召开频繁，次数多，内容重复。“只要是稍大一点的工作就把自然村干部都叫来，会议上也照例是上头来人或村长报告后即行散会居多。这种扩大干部会在自然村干部中引起的印象非常不好，他们往往这样讲‘屁小的事也开尿会’。因此，这种会议召集费时、很难召集齐整的。”^②干部三天两天一会甚至一天一会或一天多会者不稀奇，正所谓“我们的干部也不得不在会议中打圈子，好像整天都为了‘开会’似的”。^③“有些扩干会，如区选、武委整理组织召集的扩干会，在行政村扩干会讲的是哪些到自然村还是哪些，都是上头报告下面村干部们听。”^④不同的会传递相同的内容，村干部要听两次甚至多次，且每次“不论什么工作什么会议都有一套令人发呕的某某讲话、主席报告……”由此，在干部和群众中产生“八路军（政权与军队在老百姓眼中是一个东西）焖粥队，不打日本光开会”的说法。^⑤

再次，主村干部与属村干部存在沟通鸿沟。属村干部向主村干部提出问题，主村干部因无法解决只照例到属村召集村干部开会，程式化地念文件讲口号。^⑥主村干部没有针对性地帮助属村干部克服工作中的困难，发表对解决问题的意见。如在西坪“武委会上一个女干部说：我一人推磨离不开时，主持人根本置之不理。”^⑦因之，在属村干部间对主村干部形成一种失望心理。^⑧这种失望心理直接导致属村干部在主村干部开会传递消息、布置任务时毫无积极性，或故意为难不办，或借故推脱。

最后，若说干部在群众会上存在主导群众话语现象，那么上级干部在干部会上亦存在极少吸纳讨论村干部意见情形。这直接导致村干部在会议上参与度不高、不愿发言或少发言的结果。如个别干部说：“到村公所开会，人家总说：说完，谁有意见谁提。咱没意见，不值钱的意见，不提了！”^⑨

四、结语

开会作为基层政治生活的日常实践，在实现自身向体系化制度化转变之时，亦见证了中共改造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完整过程。某种程度上，其可视为观察中共在根据地权力运作的重要窗口之一。根

①《中庄群众团体材料》（1942），A141-1-110-1。

②《兴县高家村调查材料：关于政权问题》（1942），A22-1-15-1。

③《柳叶村村政权与群众团体》（1942），A22-1-20-2。

④《兴县高家村调查材料：关于政权问题》（1942），A22-1-15-1。

⑤《柳叶村村政权与群众团体》（1942），A22-1-20-2。

⑥《唐家吉村政权问题的调查材料》（1942），A141-1-125-1。

⑦《西坪自然村村政权民运组织与工作及区选领导问题》（1942），A141-1-91-1。

⑧《唐家吉村政权问题的调查材料》（1942），A141-1-125-1。

⑨《西坪自然村村政权民运组织与工作及区选领导问题》，A141-1-91-1。

据地政权建设、民众政治生活、中共与群众互动关系皆全景式地呈现在开会所建构的权力空间之下。开会之于中共的意义毋庸置疑，故笔者在此不再对前文做过多总结，而试图整理行文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思考及本文尚未解决却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首先，有关中共战时采取何种方式以维护基层政权运行的研究仍存在多重面相。除过会议还应包括却绝不限于如“填表”、“数目字”、“竞赛”、“突击”、“开条子”等具体措施。这些虽未列入本文考察范畴，但在笔者所掌握史料中并非难觅其踪。以表格和数目字为例，村的经常性工作即包括填表造表，自卫队要造表、锄奸小组要造表、村代耕队要造表、优抗济老要造表、春耕调查要造表，造表之事非常多。^①若将根据地春耕登记表汇集起来足够一人背得一驮子，根据这些表册或可作出满是数目字的“春耕总结”。^②至于“竞赛”“突击”，档案中时常可见关于突击下种、突击种棉、春耕竞赛等内容，突击工作的方式变为经常工作的“定律”，根据群众特殊要求有计划地组织竞赛是动员群众的一种方法。^③而“开条子”本身就是一种领导和工作方式，特别是布置新工作时除开会即“开条子”督促。^④因此，开会固然在建设根据地民主政权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其“不过是解决问题的开始”。^⑤或者说，中共基层政权绝非仅靠包括开会在内的任何单项举措即可实现有序运转；反之，应是多策并用、多管齐下，各项举措灵活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开会是如何与其他措施相互协作和互为促进的？会议对其他措施的实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共在不同情况下是如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采取不同措施的？

当然，开会并非中共独有。近代对会议推广完善最多，将西方现代会议制度引入者非孙中山莫属。在此基础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先后于中央和地方进行了会议实践，然开会却最终在中共政权运行过程中实现力量最大化，以致民间产生“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的戏言。换言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何能够在中共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似可回到“中共为什么能走向最终胜利”的逻辑起点。事实上，就开会而言，国民政府的基层实践并非一帆风顺，会议效果与领导层预期甚远，民众亦无法通过它真正分享基层政治权利。以中共角度看，其基层会议制度建立过程亦非径情直行，其中充满问题与挑战，迫使中共顶层设计不断作出调适。国共基层会议有何不同？面对相同困境，二者各自如何因应？

其次，鉴于效率与形式主义呈现出的孪生关系，中共作为一个效率优先的政党，会议自然亦难避

①《兴县高家村调查材料：关于政权问题》（1942），A22-1-15-1。

②《柳叶村村政权与群众团体》（1942），A22-1-20-2。

③《花园沟村政及其上下领导关系》（1942），A141-1-123-1；《兴县高家村调查材料：关于政权问题》（1942），A22-1-15-1。

④晋西区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村选》（1941年12月），A22-1-4-1。

⑤《桑蛾村村政权与群众关系》，A141-1-110-3。

免形式主义弊病。面对流于形式的会议，群众态度就是应付了事。如会上进行春耕计划调查，群众知道“不顶事”，胆小的人尽量少报，胆大的人认为“随便记多少，十垧八垧廿垧都不要紧！”性情愉快的人则开玩笑说“我的果子树是千年不结果的果子树”，“牲灵么？没有，猫和狗倒是有只！”群众对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一套很简单：不合作主义！何况除开会外其他促进中共基层政权运行的措施同样存在形式主义现象。如自然村材料尚未调查好而行政村“总结”已交到区；村选在碾子村是区长做的工作，经过是选举会前讲一次话、选举后又讲一次话，工作就算完成；区选闹得轰轰烈烈，但在自然村一个会不到五分钟便完，群众只听见“选区长”三字；劳动互助组统计表上是48个而实际连个影子没有。“在这样的工作内容与工作作风之下，在这样集中强力于开会、填表、报告、总结的情形之下”，对于具体问题，干部通常既无能力解决亦无兴趣解决。这就直接造成村政权群众基础不实、与群众联系不紧的结果。然而，中共作为一个精于学习、善于反思、追求进步的革命政党，无论出于政治力量的本能抑或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对于“表格政治和纸片政治宣布下野，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也赶快下台”“消灭空洞的表格、漫长的演说、重复的总结、无数次的会议与变幻离奇的组织形式”的呼吁在其内部从未停止，而这亦是中共“简政”的重要内容与要求。^①不可否认，形式主义作风只能极力避免，却永远无法彻底消除。这不由引发笔者对以下问题的好奇：战时中共是如何处理工作效率与形式主义关系的？采取了何种手段以纠治“文山会海”而最终又达到了怎样的效果？

除上述外，文中仅关切到中共根据地会议，那么其他政治力量辖区的中共会议怎样且与中共辖区内会议有何不同？更甚者，若中共在这些区域并未将开会作为主要工作和领导方式而又是以怎样的形式代替会议功能和作用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与此同时，从仪式、空间、剧场理论角度研究会议，会议的鼓动性、协商性、表达性具体体现在哪一环节？会议在中共政权与群众融合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① 《花园沟村政权及其上下领导关系》（1942），A141-1-123-1。

本文系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陈谦平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臧运祜教授亦提供了中肯的建议，于此特以致谢！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村支部研究”（项目编号 21AZS013）、南京大学新时代文科卓越计划中长期研究专项“中国共产党农村支部的百年建设与经验追索”（项目编号 202230005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岳靖芝，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毕业，现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革命史和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曾参与完成“‘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编校与出版”（项目编号 18BZS103）“太行山和吕梁山抗战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 16JZD035）等国家级社科基金重要课题多项，在《中国乡村研究》《近代史学刊》《安徽史学》《历史教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